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33

韩愈

李道英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6
33



目 录

- 一、韩愈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1
- 二、韩愈的思想及其政治主张/30
- 三、韩愈的文学活动及其对文体改革的贡献/48
- 四、韩诗的成就与特色/89
- 结 语/101

一、韩愈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唐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之一。国家的高度统一，中央集权的巩固，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文化及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对外的全方位开放，使国家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使唐王朝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自天宝年间开始，玄宗耽于女色，大权旁落，权奸当道，朝政日非，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终于导致了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的爆发。为期八年的安史之乱，波及大半个中国，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大唐王朝几乎土崩瓦

解。后虽平定了安史之乱，然而经过这场浩劫，唐王朝的盛世景象已不复存在，使其从繁荣的峰巅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开始了自己的衰败历程。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呈现出极为复杂矛盾的状态。大乱之后，国家又归于统一，社会也大体安定，给最高统治者带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中唐的几个皇帝，特别是德宗、顺宗和宪宗，从巩固李唐王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们希望走出衰落的阴影，治理好国家，重振国威，并且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唐德宗时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以两税法取代原有的租庸调法，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国库的收入，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唐顺宗则大胆起用王伾、王叔文和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地开展永贞革新，出台了一系列好的政治措施，诸如内抑宦官，外制方镇，贬黜贪官，重用贤才，薄赋轻徭，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等，改革虽然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唐宪宗即位后曾雄心勃勃想振兴国势，表示要接受群臣意见，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在镇压藩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尤其是平定淮西之后，朝廷扬威，藩镇慑服。从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唐王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史称这一时期是唐王朝的“小中兴”

时期。

这种小中兴局面的出现，对一部分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鼓舞，给他们带来了振兴国势、恢复盛唐气象的幻想，他们热切关注现实，积极入仕，提出了革除时弊的种种方案，以求一展宏图。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所谓中兴、繁荣，只是一种表象，有的甚至是假象，因为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并没有真正缓和，更没有得以解决。由于两税法的不完善和官吏们的舞弊，使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土地兼并且趋严重，两极分化得以恶性发展，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集团内部也由于权力之争而矛盾重重：安史之乱本身就是地方藩镇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安史之乱结束后，由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削弱，朝廷对地方失控，地方藩镇势力乘机进一步发展，他们不秉王命，私自扩军命官，实行父死子继的世袭制，为扩充自己的实力而以力相拼，兵连祸结，割据叛乱之势愈演愈烈；宦官专权形成于玄宗末年，安史之乱以后，问题也日渐严重，他们不仅参与朝政，控制一部分军权，而且控制了朝中进退大臣的权力，勾结部分朝臣，为非作歹，以至左右皇帝，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朝臣内部的党争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靠门荫入仕的豪门世族官员和经科举入仕的庶族地主官员之间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其中有革新与保

守之争，但更多的则纯属权力之争。这种绵延不断的党争不仅使朝政混乱，而且弄得人人自危。统治集团内部这种严重的内消耗，无疑大大地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实力。

中唐所面临的另一严重社会问题是佛、道盛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笃信，唐代的佛、道二教发展迅速，佛、道徒数目激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又享有许多特权，因此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他们不但吞并农民的土地，而且也直接侵犯到中小地主的利益，以致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此外，由于唐王朝总体国力的大大削弱，原来臣服于唐王朝的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或叛服无常，或乘虚内侵，也使得唐朝统治者焦头烂额，穷于应付。

这种种内忧外患，又是一部分政治敏感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感受最真切、认识最清醒的。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计，他们力主实行社会改革，调整各阶级之间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而在他们自觉要求社会改革的同时，又自觉地要求文学为其政治改革服务。

韩愈就生活在唐王朝衰落大趋势中的这个小中兴时期，并作为满怀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活跃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坛和文坛。



《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韩愈像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在家族中排行十八,故友人呼其为韩十八;曾官吏部侍郎,故世称韩吏部;卒谥文,故又称韩文公;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封为昌黎伯。

韩愈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中。曾

祖韩泰(仁泰),官曹州司马。祖父韩睿素,官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父韩仲卿,官武昌令、鄱阳令、秘书郎,卒赠尚书左仆射。韩仲卿与李白、杜甫等友善,李白曾撰《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一文,称颂其任武昌令时之美政:“未下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未居二载,户口三倍。”“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去若始至,人多怀思。”(《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九)然韩愈三岁时其父即去世。三位叔父分别是:韩少卿,曾任当涂县丞;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礼部郎中,是当时有名的文章家;韩绅卿,曾任泾阳令,不畏豪强,拆强豪家水碾以利民田灌溉。其大哥韩会,也是当时一位名人。未仕之前,即与卢东美、崔造、张正则游江淮间,好言经济大略,尝以王佐自许,天下士大夫称为“四夔”,而韩会为“夔首”。曾官起居舍人,与宰相元载关系密切,后元载因贪赃被赐死,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四十二岁时病死于任所。韩会既是政治的热衷者,又是文学的爱好者。他与当时的古文家梁肃、萧存等为友,过从甚密,并曾写过《文衡》一篇,鼓吹文章应宣传儒家思想,应有教化作用。从韩家来看,虽然官越做越小,但世代不绝,且其父祖辈多为清正廉洁的中下级官吏。这样一个没有很大权势,政治、经济地位都不算高的庶族地主家庭,浓厚的儒学和文学气氛,都使韩愈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他把韩云卿、韩会当作自己

仰止的对象,加上梁肃、萧存等人的影响,使韩愈把学习和写作古文看作自己家传的学问,自谓“能为古文学其家”。而这样一个家庭,又不能使韩愈享有门荫的特权,韩愈要步入仕途,必须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必须靠个人奋斗,通过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所有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一生的生活、思想、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五十七年坎坷而不平凡的人生历程。

韩愈三岁而孤,由其大哥韩会及嫂嫂郑氏抚养。代宗大历九年(774),韩会在长安谋到了起居舍人一职,七岁的韩愈随兄嫂迁居长安。大历十二年(777),因受元载牵连,韩会被贬为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刺史,十岁的韩愈随兄嫂离开京城至贬所。两年之后,韩会病逝,韩愈随郑夫人扶柩北上,回到了老家河阳。在河阳仅住了一年左右,中原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乱,为避乱,韩愈又随嫂嫂郑氏于建中二年(781)迁居安徽宣城,因为韩会在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县)有一处田产,即所谓宣城别业。此时家境虽已破败,但韩愈仍有条件过着“名不著农工商贾之版”的读圣贤书生活。韩愈的启蒙教育从七岁开始,但他真正认真读书的生活,是在宣城时期。他在《复志赋》中称:“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韩愈聪颖,能“日记数千百言”;又十分刻苦,“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韩愈《进学解》)。经过刻苦努力,他“尽能通六经百家学”。

韩愈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不能靠门荫轻易步入仕途,而“少小好奇伟”的韩愈又看不起那些胸无大志的凡夫俗子,他要“事业窥皋(皋陶)稷(后稷),文章蔑曹(曹植)谢(谢灵运)”(《县斋有怀》),一展自己的才华,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因此,十九岁的韩愈便于贞元二年(786)离家赴京,开始了他艰难的求仕生涯。韩愈对自己的学问和才干十分自负,他在《复志赋》中写道:“忽忘身之不肖兮,谓青紫其可拾。”进京的目的就是要俯拾青紫,真可谓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然而求仕之途并不像他幻想的那么美妙。

韩愈到长安去的可靠落脚点是投靠时任殿中侍御史的族兄韩弇,而当韩愈跋涉到长安时,韩弇则因事到了河中,韩愈又立即追至河中,但因韩弇肩负着与吐蕃议和缔盟的重任,韩愈无法久留河中,于是又回到长安,不久,传来吐蕃劫盟、韩弇遇难的噩耗。京城米贵,居大不易。韩弇之死使韩愈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为生活所迫,韩愈只好在大街上拦马求见北平王马燧。马燧是力主和戎的人物,念韩弇为王事殉难,收留了韩愈,使他暂免于冻馁,对此韩愈感激涕零。从此时开始,韩愈致力于科举考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在激烈的竞争中,要考中进士谈何容易!韩愈分别于贞元五年(789)、六年、七年三次应进

士试，均名落孙山。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试。这一年的主司是陆贽，而由梁肃和王础通榜。陆贽是贤士，梁肃、王础均为古文家，且梁肃与韩愈有着实际上的师生关系，因此，韩愈榜上有名，终于取得了入仕的资格。根据唐代的规矩，通过了礼部的进士考试，并不能马上做官，仍须参加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贞元九年，韩愈第一次应博学宏词科考试，以《太清宫观紫极午赋》和《颜子不贰过论》被崇尚古文的主司崔元翰赏识而入选，但在上呈中书时却无端遭到淘汰。他被挤掉的原因主要是因其文章“实与华违”，即他所写古朴淡雅的古文不合时俗。接着韩愈又于贞元十年、十一年两次应试，均为主司所辱。韩愈自以为学优必仕，但仕途坎坷，“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上宰相书》）。这对他的确是很大的打击。他从到长安的第二年起，已不能从家中得到物质支持，求食于人，生活极为窘迫：“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上宰相书》）岁月蹉跎，使他产生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始终，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即是说曾经打算放弃仕途，去过归隐山林、著书立说的生活。但是斗争的结果，还是“忧天下之心”战胜了隐山林之意，他又振作精神，积极为

做官而奔波，他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给宰相写了三封信，毛遂自荐，请求做官：“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并以蹈水火者自比，大声疾呼求宰相“垂怜”。但当时的宰相贾耽、卢迈、赵憬，均为尸居禄位的庸人，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请求。韩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卖掉了自己的马作路费，于贞元十一年（795）五月离开长安，郁郁东归。

韩愈求官几近十载，没有捞到一官半职，其情景酷似当年的杜甫。这十个年头，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官场的现状，体验了世态之炎凉。但韩愈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他在离开长安前夕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惧足下以吾退归，因谓我不复能自强不息，故因书奉晓，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也。”（《答侯继书》）韩愈是个有才干、有抱负的人，而今眼看到了“而立”之年，竟然一事无成，其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也是不言自明的。他在东归途经潼关之时，遇有某地方官笼白鸛鸽鸟而进献于天子者，耀武扬威，声势显赫，“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他对此感慨万端，写下了《感二鸟赋》，深感人不如鸟，“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生不逢时之慨，溢于言表。

然而韩愈一回到洛阳，好运就降临到他的身上了。韩愈虽然没有得意于官场，但其文名已自

不小。当时在洛阳的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董晋，一眼看中了韩愈，请他入自己的幕府。董晋身为宰相，其幕僚多为资深之士，这一点使布衣之徒韩愈大为感动，终生铭记董晋的知遇之恩。韩愈于贞元十二年秋随董晋入汴州，开始似乎没有正式任命官职，而以清客的身份在府中帮闲。帮闲的日子虽然过得潇洒清闲，但待遇也低，这对亟待解决衣食之需的韩愈来说，确实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也使他心情不大平静，他在其《复志赋》序中说：“愈既从陇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复志赋》。”显然，韩愈并非真想回家休息，而是因生活困难闹情绪。董晋大概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正式任命他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的职衔出任汴、宋、毫、颍等州观察推官。推官也是闲散官职，除当过一次汴州地方考官外，并无多少公事可办。对于这种刻板的幕僚生活，韩愈也不大开心，但在公务之余，他的私人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他喜欢博塞之戏，喜欢与李翱、孟郊、张籍等朋友交游论辩，喜读书自娱和写文章，这一切又使他乐在其中。但是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799）二月，董晋薨，汴州大乱，不少幕僚都死于叛军之手，而韩愈则因护送董晋的灵柩回洛阳而幸免于难。丢官之后，经过一番周折，于二月底，韩愈举家来到徐州。

韩愈到徐州的目的是投靠张建封。张建封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一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宋營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每卷首
具列卷中篇目馮悉以朱墨減截
之惟存其都凡集外別有目錄一
卷今按李漢所作序云摠七百首
并目錄合四十一
卷則正与馮合

賦
古詩

感二鳥賦

并序○
五登進士第時德宗二十

元八年至十一年公二月二十八尚未
得仕故是年正月二月三月連上
宰相三書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
庸人不錄用五月代辰象歸自適

朝鮮李朝仁祖十一年(1633)刊活字本《昌黎先生集》书影

韩愈曾在京城相识，时任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将韩愈安排在徐州附近的符离睢上，给予了不错的生活待遇：“篋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清风窗户凉。”（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妖姬坐左右，柔指发哀弹。酒肴虽日陈，感激宁为欢？”（韩愈《蚺蚺》）衣食有余，歌舞宴饮，真可谓盛情款待了。韩愈对此虽十分感激，但并不大满意。因为韩愈所追求的不只是日饱三餐，夜图一宿，而是要做官。这一点张建封也是明白的，半年之后，遂任命韩愈做了节度推官，参谋军事。他虽经常陪张建封到球场去击球，到猎场去打猎，但这里的幕僚生活依然不能使他满意。张建封官大气盛，刚愎自用，而韩愈则直言敢谏，二人也不大合得来，《旧唐书·韩愈传》说：“公发言直率，无所畏避，竟以此不合。虽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也。”韩愈又陷入了去留的矛盾斗争之中。终于于贞元十六年五月离开徐州，返回洛阳。韩愈刚离开徐州，张建封突然死去，徐州大乱，韩愈又幸免于了一场祸乱。

韩愈在洛阳赋闲，选择了一处草树茂密的所在，过着读书、写作的生活。他在《与孟东野书》中说：“一室之内，有以自娱。”他的《原道》、《原毁》、《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名作都写于此时。闲暇无事，他就去登山，访寺，观赏壁画，还约侯喜、李景兴、尉迟汾等朋友到洛滨垂钓，也与年轻朋友李翱等论文析道。但是，韩愈并无意在此当隐士，贞元

十六年、十七年，他曾两次赴长安听从调选，约在贞元十七年秋冬之时，被任命为国子四门博士。

四门学馆是当时国子监下设的六个学馆之一；博士虽属教授一级的学官，但也只是正七品的小官而已。韩愈对这个七品芝麻官虽不太满足，但还是为尽到博士之责而努力工作。贞元十九年（803）京畿大旱，有人提出“罢吏部选、礼部贡举”建议，韩愈坚决反对，并上《论今年权停选举状》，认为选举事关为国选拔贤才，绝不可停止。他又冒着极大风险写下了《师说》一文，张扬从师求学之道，对当时耻于从师求学的不良风气严加批判，并因抗颜为师而被世俗之徒目为狂人，并得狂名。贞元十九年秋，韩愈博士任满，经御史中丞李汶推荐，出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正八品下，官位不高，俸禄不厚，但其“掌分察百官，巡按州县，狱讼、军戒、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荐焉”，属清要之官，有发言权，这是韩愈最为满意的，再加上与柳宗元、刘禹锡、张署等好友同为御史，更使他感到心情舒畅。作为负有言责的谏官，韩愈对自己的工作是尽心尽责的，但他的倒霉也就在这“认真”上了。贞元十九年京畿大旱，田种所收，十不存一。皇帝下令蠲免百姓租赋，而京兆尹李实竟然照样聚敛征收，逼得百姓家破人亡。韩愈到京郊调查，看到农村的悲惨情景，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写下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如实反映情况：“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

钱，寒馁道途，毙路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迫征。”他认为：“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优恤。”并特别强调指出，京郊的惨状是“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而自己是“知恩思报，有见辄言”。这无疑是在弹劾贪官李实。李实是皇族，又一贯横行不法，韩愈拿他开刀，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结果李实从中做了手脚，韩愈无辜被贬为阳山（今广东省连县）令。“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韩愈就这样结束了他短短数月的谏官生涯。

贞元十九年冬天，韩愈离京赴贬所，同行的有被贬为临武令的好友张署，难兄难弟，结伴同行，经过十生九死的艰难跋涉，于贞元二十年（804）四月到达目的地。一千多年前的广东连县，的确是一个极为荒僻的边远小县，“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韩愈《送区册序》）。韩愈蒙冤发配至此，其激愤不平之情可想而知。然韩愈也颇能自寻其乐，他探幽访胜，享受这里的佳山丽水；他与好友相约松桂林中，读书赋诗；他交结了一批新的朋友，热心指点和奖掖后进之士。当然，作为一个地方官，他忠于职守，勤于官务，关心百姓疾苦，深得民心，因其“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新唐书·韩愈传》）。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崩，顺宗即位，